



# 如何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读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 金依祺

1939年12月10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云认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此针对边区干部队伍当时存在的问题，陈云认为应该从提高老干部政治文化水平、搞好新老干部团结、解决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纯洁干部队伍等四个方面入手打造干部队伍。这对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 提高老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

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边区队伍中许多老干部有着宝贵的经验，是重要骨干，但因为不识字，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导致其无能力看报，学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对许多东西不懂得，对许多地方事务不了解，眼光只局限在陕北，不能放眼全中国，长此以往不仅无法胜任边区工作，对革命的开展也有重要影响。针对此种情况陈云强调，边区老干部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要从现在做起，下决心努力提高文化水平，要有计划地持之以恒地看书，一年不成两年，慢慢学下去，不断提高自己知识水平，进而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针对有些同志提出学习就要进党校、进马列学院的问题，陈云引用毛泽东关于“长期大学”的建议，认为不是只在学校才能学习，在日常工作中、在革命斗争中一样可以学习，鼓励边区老干部在坚持自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要结合革命实

践，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结合具体工作不断提高知识水平，才能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

## 搞好新老干部团结

全面抗战期间，随着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建立，军队的不断扩大，陈云认为，只有把大批的新干部、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干部队伍中，充分利用好知识分子这一重要革命力量才能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与文化运动，进而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同时他指出，“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来，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这样就发生了一个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这里说的老干部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新干部是指为了革命需要吸纳过来的知识分子。老干部认为新干部经验少、资历浅，不能胜任领导职务。新干部认为老干部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土包子”。这样一来，新老干部互相看不起，在工作中难免产生摩擦，便出现了新老干部不团结的现象。

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新老干部各有优势与不足，“许多老干部，他们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知识分子新干部读书多，会说会写，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空洞”。为此，陈云强调新老干部作为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团结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知识分子作为新干部，难免有许多不足，老干部应该尽可能地帮助新干部克服毛病，引导他们走向正确道路，使其逐渐变成一个优秀的合格的党员。新干部也应该帮助老干部学习理论知识，增加知识储备，使其早日成长为合格的高素质干部。

## 解决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

在全面抗战背景下，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革命胜利，陈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干部中间开展有原则的思想斗争，以纯洁干部思想。解决干部中间的思想斗争问题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

在干部中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的来说“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具体来讲，首先，应该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开展中要注意倾听群众意见，如果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要给予严肃批评，甚至纪律处分。其次，领导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先检查自身，批评自己，出现问题领导要承担首要责任，如果一味地批评他人，谗过于人，批评不仅没有效力更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同时“在批评下级的时候，领导者说话要慎重。领导者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在下面就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最后，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态度采取上，要保持客观，不应只看局部、只看现象，要看全面、看本质。对此，陈云就军民关系予以说明，他指出军民关系总体上是融洽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军民关系难免有摩擦，军队应多开展自我批评，时刻注意把军民关系搞好，群众才能为军队提供更好的后援支持，军队才能更好地完成保卫边区的任务。

## 纯洁干部队伍

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是在革命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陈云指出：“我们

内部队伍是巩固的、坚强的，如果敌人打过来，就可以把他们打出去，最怕的就是我们内部有坏分子。如果内部不巩固，外面的进攻就抵抗不住。”因此纯洁干部队伍是迫切且必要的。陈云着力强调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不仅要警惕那些公开反对我们的人，更要警惕的是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反对，用各种办法混入党内和政府内，搞各种破坏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在革命根据地和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的一类人。因此，为了最大程度争取抗日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

纯洁干部队伍，首先要做好防微杜渐工作，遇到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其次，对于危害党的事业的坏分子，应该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不肯改正者给予开除。最后要争取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任何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广大群众。陈云指出，纯洁干部队伍直接关系到党的巩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小事，要给予重视。同时他认为，只要我们按照以上方法坚决稳妥地去做，纯洁干部队伍是有保障的。

处于新时代的今天，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解决好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仍然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情形下重温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于我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巩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是近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不论是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梁漱溟、钱穆、胡适、陈寅恪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受他的影响。胡适曾在《胡适留学日记》里写道：“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梁启超一生著述1400多万字，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

## 以救国为“主宰” 涤故更新

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他说：“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亦然”，但“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梁启超治学“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他一生都在不断思考、选择、调整和扬弃自己的学术理论，“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在日本，他广泛接触研究西方启蒙思想。美洲之行，他看到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贫富分化，转而研究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学说。游历欧洲大陆，他目睹一战后资本主义文明受到质疑，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旋即投身用西方可研方法整理国故，建设新国学。五四运动前后，他组织的共学社也曾大量翻译出版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社会主义的著作。因而，郑振铎评价，“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

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惟务求国之独立。在梁启超多变的思想中，始终不变的是为救亡图存而治学的信念与责任。爱国主义是他一生追求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源泉。他认为为学要“立乎其大”、要有“头脑”和“主宰”，“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曾表明自己办事的宗旨未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方法则可以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

## 找着方法去自求与协作

梁启超认为，“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

要学会点石成金的方法。梁启超把做学问的方法称为“点石成金的指头”。他认为，做学问不仅要看前人的研究成果，还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去自行探讨。如果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又能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那么，用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他注重和倡导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知读书之先后次第。他重学术源流、历史沿革得失、中外比较。为帮助留学生更好读书他写了《东籍月旦》，评价日本学说并用目录学的方法，将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认为“凡求学者，必先治普通学”。他曾列出青年学生无论文理都必须读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若未读则“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西学书法》说明了读的先后缓急。他还主张求西学应选择，否则“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

第二，“读书莫要于笔记”。梁启超认为“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他说，笔记是围绕读书中的注意点抄录，抄书是提起注意和继续保存注意最好的方法。读第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换一个注意点，几遍之后可以同时注意几个点。而且“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如果勤于抄录就“可以渐进于著作之林”。虽然笨极了苦极了，但是真正做学问的人离不开这条路。

第三，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梁启超评价颜元时说，“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认为以实学代替虚学，以动学代替静学，以活学代替死学符合教育新思潮。他积极创办学会、学堂、报刊、译书局，规划大同译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

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

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对于巨大庞杂的研究，梁启超主张联合有共同兴趣的学者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体系。因为，大量输入世界学说必须按其本来面目并有条理本末，方能供国人研究之用，“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整理旧史如“披沙拣金”不仅辛苦，而且“淘金之术”不精则会“取沙弃金”，要“联合国中有全学兴味的学者，备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他曾介绍梅文鼎既不“薄古法为不足观”，也不株守旧闻。他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 勤“攻”并调之以趣味

梁启超说，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责任心和兴味做基础的。“‘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

读书就是攻书。梁启超一生求知欲强，好学成癖，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工作量惊人，即使在病中也著述

用典释义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

【讲话原文】

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卫国英烈、建党先驱、工农运动领袖、抗日英雄、开国将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出处】

昔齐桓晋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

——（唐）房玄龄等《晋书·熊远传》

【解读】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出自《晋书·熊远传》。意思是说，人们内心所归向的，只有道德和仁义。

“人心所归，惟道与义”是东晋大臣熊远给晋元帝司马睿的谏言。他以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为例，早年齐桓公英明无比，心忧天下，各国共推其为盟主；自葵丘会盟确立霸主地位后，齐桓公逐渐骄傲自满起来，原先归附的国家纷纷背叛。在熊远看来，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是立国之本，而要聚合民意、汇聚民心只有靠道德和仁义的力量，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对于刚刚成立的东晋王朝而言尤为重要。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群众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方土地，共同开发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书写我们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我们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一次次试图改变中华民族备受屈辱命运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正是受到这一感召，全国各族人才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风雨同舟，万众一心，攻坚克难。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心归仁”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推动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就能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杨立新）

时候，不真正明了自己适合做什么。在博涉中可以引起问题，发生趣味，确立深造和专攻的领域。

无涉猎则不能通。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则不能触类旁通。他提倡每天读的书应分为精熟类和涉览类。涉览主要用来训练很快，博搜资料。对于一门学问，他主张求真求博求通。先要知道“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为什么如此。博是为了弄明白事物真相，要对同类和相关的资料进行贯穿比较，而且越多越好。通是要注意一门学问与其他学问以及自身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他说，“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显微镜生活”的毛病，镜里头的事物看得详细周密，镜外却完全不见。

无专精则不能成。周海粟曾问梁启超“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答曰“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治学要深厚，“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个人要以十之七八的功力用于专精，十之二三的功力用于涉猎。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一个渔夫同时撒一百张网是不可能捉到大鱼的。谈修身书应以守约为主，博涉为辅。守约法即“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关键要饮得透，将其在心中、口中念到极熟，体验到极真切，遇事就自然会运用，运用多了就成为自己的一种人格力了。而治史学则须“贵专精不贵杂博”。无论多大的天才和精力，包办全是是不可能的。要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的兴趣和准备研究，做到透彻周密。如还有余力，再做旁的学问。



## 贵专精又须以博涉为辅

梁启超认为“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且，学者读书少的